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口语与书面语

[英] M. A. K. Halliday 著

于 晖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语与书面语 =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英文/ [英] 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 1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100-4201-0

I. ①口… II. ①韩… III. ①英语—口语②英语—书面语 IV. ①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5242 号

Originally printed in 1985.

口语与书面语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著 者: [英] M. A. K. Halliday

导 读: 于 晖

责任编辑: 梁沁宁

封面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 //www. wpcbj. com. cn](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4201-0/H · 1284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11-1599

定 价: 26.00 元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

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口语与书面语》 导读

于 晖

1. 引 言

本书是韩礼德教授讨论口语与书面语区别的重要著作，1985年由迪肯（Deakin）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1989年再版。该书尝试探索人类语言的源起，追溯语言文字的发展，并系统对比和分析了书面语与口语的特点。概括来讲，书面语的特点是词项密度高，语法隐喻现象较为普遍；口语则有韵律，语法结构复杂。

2. 章节内容介绍

第一章 言语的发展

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久远，大约有两三百万年的时间。人类在众多物种中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人类可以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并能够用语言进行交谈。这些能力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其中，人类的语言能力尤为重要。然而，我们已无从得知语言的发展过程，只能从现有的语言现象推断语言的演化历史。

生物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胚胎在子宫的孕育过程再现了地球物种的进化历史。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我们或可据此推测，人类婴幼儿习得语言的过程再现了语言的发展演变历史。儿童在完全习得母语之前，往往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原始语言系统。从原始语言到母语的这一过渡也许可以模拟人类语言的发展进程。

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交流。同人类进化的过程相似，婴儿需要掌握两种基本生存技能：一是使用工具；二是交谈。通过使用工具，人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和改变环境；通过交谈，则可以使他人间接地改变环境。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象征性行为，也就是意义。婴儿大约在七八个月大小时就可能有一些象征性行为，但这些行为不能等同于母语。以奈吉尔（Nigel）为例，他在八个月左右时就开始有自己的一套原始语言系统，并逐步将之完善。婴儿使用语言的动机不外乎两种：一是用语言实现某个目的，如得到某物体，这种功能具有实用性，这时的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二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这种功能是思考性的，语言所起的作用是反思。

原始语与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原始语的系统有两个层面——意义和声音，意义通过编码直接加工为声音；而语言系统有三个层面——语义、语法和语音，语义通过词汇语法层面加工为语音。这样一个原始语系统的缺陷在于它所能表达的意义是受限的，一次只能表达一个意思。人们如果想要表达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原始语就不再能满足其要求，这就成为人们发展语言的动力。

第二章 文字系统

早在久远的年代，人类祖先就开始在洞中的岩壁上作画，绘画承载并传递了某些特定的信息。然而，绘画却不是文字。人类婴幼儿早在会说话之前就学会了涂鸦，并且逐渐懂得涂鸦与写字之间的区别，不过幼儿从涂鸦到写字这个过程似乎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期间并没有过渡。这与语言的发展过程不同，人类从岩壁作画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发展为书面文字。

虽然绘画可以表达丰富的含义，然而绘画并非文字。两者的差别在于，我们可以大声诵读文字，却无法大声诵读出一幅绘画。两者看似完全对立，但也有相通之处。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绘画与语言逐渐融合，当人们将图形解释为语言时，就形成了语言的文字系统。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就可以体现这种融合。古汉语从初始的象形文字逐步发展为以单音节的字为单位的文字系统。古埃及语的文字最初也以字为单位，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许多文字又可以分解为多个音节。这种多音节现象在腓尼基语中得到增强，所以腓尼基语的文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书写系统。后来，

古希腊人借用腓尼基语中的字母并加以改进，创立字母表，每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而非音节。由此看来，世界语言的文字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以字、音节和字母为单位，然而这种分类却不能绝对化。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任何语言都高度复杂，语言的文字系统也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各种复杂的变化。

第三章 书面语

一旦出现了文字，语言就会朝着规范化进程发展。以英语为例，英语文字的出现逐步统一了已有单词的拼写，并为新兴单词的拼写提供依据。这种规范化进程固然部分是出于便利的考虑，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字往往与文学、宗教、教育等受人敬仰的领域相联系。所以说，文字的出现对语言的规范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文字的贡献巨大，文字书写的语言却不能记录下口语所有的特点。

口语的特点是韵律，伴随有副语言（paralinguistic）特征，这些特点很难在书面语中体现出来。口语具有即时性，书面语却不具备这种特性，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口语或可具备书面语的特点，书面语同样也可以具备口语的特点。此外，口语有韵律，书面语虽不具备口语的韵律，却有机制用于弥补这一缺陷，标点符号正好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

书面语中的标点符号具备三种主要功能：一是确定单词或是句子之间的边界；二是可以体现句子的功能，或陈述，或疑问，或感叹等；第三种功能可以笼统地归纳为关系标记词（relation marker），即标记各种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

人类经历了从以狩猎为主的群居生活到以农耕为主的生活变迁。在这一过程中，语言需要具备新的功能，书面语正是为满足新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书面语绝不仅仅是把口语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事实上，在许多语言文化的历史上，书面语与口语的发展自成体系，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书面语与文字也不相同，文字是把语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书面语是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

第四章 口语：韵律特征

口语典型的体现形式是自然、即时的会话，但如果我们把口语以书面

的形式记录下来，其结果是会丧失一定的信息。这是因为在书面语中，口语独有的特点不再被保留。口语区别于书面语的典型特征是其语调（intonation）和节奏。通常来讲，节奏作用于语音层面，是音节的组织模式，而语调作用于词汇语法层面。在英语语言中，语调可以区别不同的语法结构，如表达不同言语功能的直陈句、疑问句和祈使句等。

语言是有节奏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诗歌。诗歌中每一诗行中的音节有规律地强弱交替。音节的这种规律性交替被称为诗歌的格律。诗歌有着较为严格的格律。如果我们以日常生活口头会话的方式朗读诗句，可能读出完全不同于诗歌格律的韵律来。在日常生活中，音步（foot）是语言韵律的基本单位。所有口语都有韵律，只不过自然即时的口语的韵律性更强。

声调群（tone group）是比音步更大一级的语言单位，包括调核突出（tonic prominence）和声调（tone）。每一个声调群往往代表一个信息单位。调核突出通常落在承载新信息的语言单位上。

第五章 书面语：词项密度

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均极其复杂，但两者各有其复杂之处。口语的复杂性在于语法；书面语则是由于其高词项密度——词项密度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定的文字所传递的信息量。书面语的词项密度远大于口语的词项密度。

词项密度的计算非常复杂，涉及较多因素。首先要考虑词项（lexical item）在语言中所占的比重。词项即我们传统语法中所说的实词，与之相反的是语法项（grammatical item）或虚词。因为词项传递主要信息，所以词项越多，词项密度就越大。其次，语言中有一些常见的词项，由于使用频率过高，词义会逐渐虚化，其作用介于词项与语法项之间，这样的词项并不能增加词项密度。反之，使用频率低的词项所承载的信息量高，能大大提高词项密度。考虑上述因素后，小句（clause）是用于计算词项密度的较为理想的语法结构。之所以弃用传统语法中的句子概念，是因为句子是书面文字的语言单位，而小句是一个功能单位，集及物性、语气与主位为一体。

小句在容纳信息量方面具有较大的弹性。以名词词组和介词短语为例，名词词组可以出现在介词短语里面，而介词短语又可以作为后置修饰

语出现在名词词组后面。两者通过“降级 (down-ranked)”或是“嵌入 (embedded)”的方式相互循环叠加,可以极大地扩充小句的信息量。相比名词性词组而言,动词词组所含信息量要逊色许多,其承载信息的语言单位只有一个动词。可以说,语言中主要的信息出现在名词性词组里。这是书面语中出现名词化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涉及小句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动词或小句经过名词化过程,出现在小句主位结构或信息结构中的位置就可以更加灵活。

简言之,书面语的特点是,以每一小句的词项数目而计,书面语的词项密度大。书面语有较强的名词化趋势,正是这种名词性结构赋予了小句极大的灵活性。

第六章 口语:语法的复杂性

一般情况下,口语给人的感觉是杂乱无序,因为一旦我们把口语以书面语的形式转录下来,呈现出的文字看起来并无规律可循。此外,就词项密度而言,口语给人的感觉是内容不如书面语充实。通常情况下,书面语的词项密度是口语词项密度的两倍。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语传递的信息就不丰富。

口语与书面语的主要区别在于三个方面:传播介质、语言所起的功能和语言的形式特点。口语通过口头传播,具有发生快的特点,并能根据变化的语境进行适时调整,传递微妙的人际意义。尽管书面语传统上与权势地位这些概念相联系,它却不具备上述优势。书面语和口语都是人类经验的表征,但前者如油画,呈现的是静态的语言产物;后者如电影,表现为动态的交流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语言传播媒介逐渐多样化,替代了部分传统媒介,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区别也逐渐淡化。

在结构方面,口语的组织性丝毫不比书面语逊色。书面语可以通过名词化现象把人类高度复杂的生产活动、经验过程等压缩在一个小句内。口语则不然,由于其即时性和动态性,往往需要不同的小句表达两个以上的行为过程。这些小句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以一定的逻辑语义关系组合为小句复合体。这样一个复合体中的小句,其间的语法、语义关系高度复杂却又不失系统性和规律性。正是由于口语自身的特点才产生了口语复杂的语法结构。

第七章 说话、书写与学习

口语和书面语是用语言表达意义的不同手段，也可以说是语言的两种不同输出方式。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语言本身，而不应当过分执著于传播的介质。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概括出口语和书面语的一些大致区别：口语和书面语都有彼此不具备的特点，比如书面语不具备口语所特有的韵律和副语言特点，口语则没有书面语的句子和段落边界；书面语和口语用于不同的语境，体现不同的功能；口语和书面语用不同方式记录人类的生产活动经验。那么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更接近语言的真实面目呢？

与书面语相比，口语可能更能体现原汁原味的语言。书面语含有较多的隐喻，而频繁的名词化现象就是语言隐喻化的主要例证。隐喻是一种复杂抽象的语言现象，这一点或可从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得到印证。儿童习得语言大致需要经历三种过程：从个体到普遍、从具体到抽象、从直白到隐喻。儿童对隐喻语言的理解与掌握通常出现在习得语言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八九岁左右。从这种意义上讲，书面语相对脱离人类最直接的生产活动经验；反之，与实际经验的脱离也间或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在教育领域，我们不仅通过书面语学习，也通过口语学习。知识经由教师代代口授相传，口语在教育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书面语是体现权势与地位的语言，传统的语法也是针对书面语而编纂的，是描述理想化语言的语法，有一定的规定性，所以这种语法不能反映出语言使用的全貌，因此现代语言学日益重视对口语的研究。

这种转变是对的，因为首先人类的语言起源于口语；其次，口语也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最后，我们不仅通过读写的手段来学习，也需要听说的途径。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语言都是人类现实的组成部分，是对现实的记录，也是现实的影像。

3. 结 语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的重要特征。然而语言非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人类祖先在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完善的交流系统。语言最早以口语的形式出现，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产生了

书面文字。关于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有两个理解误区。第一种误解为，书面语只是口语对应的书面记录形式。事实上，由于口语与书面语的传播介质不同，在功能方面也起到互补的作用。口语用于日常人际交流，转瞬即逝；书面语用于记录事件，永载史册。两种语言体系的发展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两套相对独立的体系。即使我们把一段口语以书面的形式逐字逐句忠实地转录下来，也很难完全体现这段口语所包含的全部信息。第二种误解为，书面语是权威经典语言的典范，远比口语更为重要。所谓对语言的研究就是对书面语的研究，这种误解起源于书面语在历史上的用途。早期书面语与宗教、祭祀、历史、文学等令人敬仰的领域相连，这种联系使人们误以为书面语在语言研究中更为重要，通过对书面语的分析更能揭示语言的本质特点。事实上，口语与书面语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口语更接近语言的本质。这不是因为口语远比书面语的历史悠久（虽然事实如此），而是因为口语自身的特点。人们的日常生活会话稍纵即逝，这就要求会话参与者不断调整语言以适应瞬息万变的语境。在这种即时调整的过程中，语言的语义乃至语法等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正是在口语会话过程中，语言的语法体系日臻丰富和完善。书面语以词项密度高、信息量大见长，口语则以语法结构复杂取胜。两者的地位无所谓孰轻孰重。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两种语言传播介质的区别日渐消逝，但人们对于语言的探索却不会停息，对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语言多样性的理解。

语言学发展至今，在语义和词汇语法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人们对语音、书写、书面语和口语系统的研究则相对滞后。韩礼德教授在本书中的开拓性研究，填补并丰富了相关研究的不足，从而使我们对上述现象第一次有了系统了解，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起点。韩礼德教授知识渊博，眼界高远，本书研究涉及的现象横跨整个人类文明史；其思想深邃，分析一向精细入微，深入而浅出，表述明晰晓畅而内容大气磅礴，能于平凡之处洞开一片天地，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特点再一次充分体现于本书对各议题的阐述中。

About the author

M. A. K. Halliday

Michael Halliday was born in Leeds, England, in 1925. He took his BA at London University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n studied linguistics as a graduate student, first in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and Lingnan University, Canton) and then at Cambridge, where he received his PhD in 1955.

After holding appointments at Cambridge and Edinburgh he went to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1963, as Director of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re he directed two research projects, one in the Linguistic Properties of Scientific English and the other in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Teaching; the latter produced *Breakthrough to Literacy* for lower primary schools and *Language in Use* for secondary schools. In 1965 he was appointed concurrently Professor of General Linguistics,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building up a new department in this subject. He remained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til the end of 1970. From 1973 to 1975 he was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 Circle. At the beginning of 1976 he became Head of the new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he post that he now holds. He was consultant to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s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ject 1976-78 and subsequently a member of the Project Review and Advisory Panel.

He taught o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s summer Linguistic Institutes in 1964 (Indiana), 1966 (UCLA), and 1973 (Michigan), and was elected to honorary membership of the Society in 1978. He has held visiting professorships at Yale, Brown, UC. Irvine, and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and in 1972-73 was a Fellow of th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ford, California. In 1969 he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Nancy, France; and in 1981 he received the David H. Russell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rom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USA).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 semantics and grammar of modern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text lin-



guistics and register variation;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of linguis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which h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enman' project at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mong his publications are: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ublica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Vol. 17, Blackwell, Oxford, 1959.

(With Angus McIntosh & Peter Strevens)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gman, London, 1964.

Intonation and Grammar in British English, Mouton, The Hague, 1967.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Parts 1–3',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3, 1967 and vol. 4, 1968.

A Course in Spoken English: Into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0.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Edward Arnold, London, 1973.

Learning How to Mean: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dward Arnold, London, 1975.

(with Ruqaiya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Longman, London, 1976.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edited by Gunther K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6.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Edward Arnold, London, 1978.

(with J.R. Martin) (eds) *Reading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Batsford, London, 1981.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 London, 1985.

Preface

We live in what is called a 'literate society', which means that a reasonably large proportion of older children and adults in the community use language in a written as well as in a spoken form. They have learnt to read and writ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come naturally, unless one is born deaf; they also have to be learnt, of course, but — like walking and running — they are learnt young and without benefit of instruction. To get to read and write, however, one is usually taught; this is one step,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associated with educated practice from the start.

Writing and speaking are not just alternative ways of doing the same things; rather, they are ways of doing different things. Writing evolves when language has to take on new functions in society. These tend to be the prestigious functions, those associated with learning, religion, government, and trade.

Partly because of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sources of authority and power — but partly also because it is nearer the surface of our consciousness — writing tends to steal the linguistic limelight. For most literate people, 'language' means written language. We talk about how letters are pronounced, instead of, more accurately, how sounds are written down. We say our language is 'not phonetic', meaning that the spoken forms do not accord with the writing system — whereas in fact it is the written forms that do not accord with the sound system. Even the notion of a 'word' is tied to the written mode. And if something is written down, we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believe it. It is no wonder that, as teachers, we tend to assume that written language is the only respectable medium through which to learn.

But speech came first, by some millions of years; and it comes first in our life history as individuals. We may have learnt to read and write, but we still go on talking and listening; and we still go on learning by talking and listening. The fact that we are less conscious of the processes of speech does not make them any the less important. We achieve different goals by means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but neither has any superior value over the other.